



一校两党，同根异路

热血青年汇黄埔，有人问，他们是救苦的罗汉还是吃人的野兽？

公元1924年6月26日，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特别是军事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南国最大城市广州以东20公里处的黄埔长洲岛上，隆重举行了“陆军军官学校”的开学典礼。珠江中这个面积不过两平方公里的小岛上，一时热闹非凡，码头上也是船艇连桅。由于当天烈日炎炎，天气闷热，按照那时的习惯，要求人们都有随从在旁边打伞遮阳，于是小岛上出现了一派“冠盖如云”的景象。

孙中山身着白色的便服，头戴一顶“拿破仑帽”，在夫人宋庆龄的陪伴下走下“香固”号军舰，然后迈步跨进离江边只有二十几米的校门。在这个门梁上面，刚刚写上的“陆军军官学校”几个大字分外显眼。此时，嘹亮的歌声和口号声



黄埔军校



红色起点

HONGSE QID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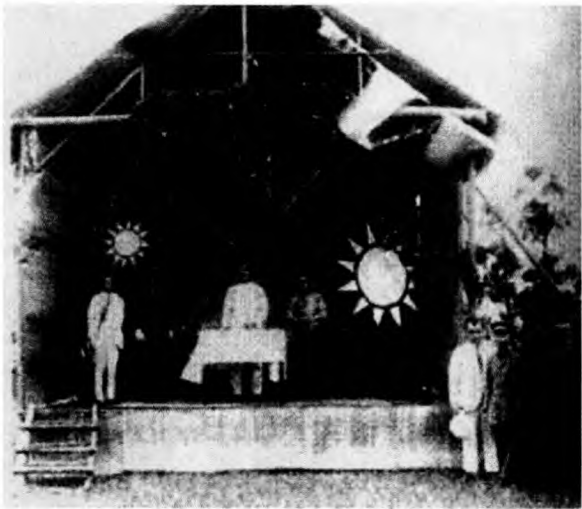
从园内传出,几百名生龙活虎的学生持枪列队,迈着整齐的步伐前来欢迎。当孙中山兴奋地向他们频频致意时,旁边有些对军校不以为然的旧军人和政客却在议论道:

“谁知道这几百个学生,将来是几百尊救苦救难的罗汉呢?还是几百只吃人不眨眼的猛兽?”

其实,“罗汉”还是“猛兽”很难一概而论。这几百人虽然从一个起点出发,后来却走上了两个不平凡的极端。中国军事史乃至整个近现代历史,都大书特书了校园里这些师生的姓名——此刻校内教官队伍中,既出了何应钦、陈诚、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等“党国要员”,也涌现叶剑英等共产党的开国元勋;此刻军校第一期的莘莘学子中,既有后来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胡宗南、杜聿明、郑洞国、孙元良、桂永清、王叔铭……,也有共产党最早的军事指挥员徐向前、陈赓、周士第、左权、蒋先云……

|| “联俄容共”——苏式军装包裹起学生兵 ||

上午9时,孙中山和宋庆龄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陪同下一同登上大操场边搭起的简易检阅台。穿着灰军装的校长蒋中正(字介石)和身着浅色西装的党代表廖仲恺,也站在检阅台上。众多的来宾中,既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胡汉民、汪精卫、张继,大本营军政部长程潜、外交部长伍朝枢、广东民政厅长孙科等;还有归附于孙中山的广东各实力派代表人物,如粤军的首领许崇智、湘军的首领谭延闿和程潜、建国豫军首领樊钟秀、滇军首领刘震寰、桂军首领杨西闵,以及被



孙中山检阅黄埔军校学员



称为“福军”头目的广州河南的地头蛇李福林。

检阅台前，470名学生列成方阵，外观上也是地地道道的“以俄为师”。每个人都身穿苏式黄色卡其布的新军装，足蹬翻毛皮鞋，并肩荷日本的明治三八年（1905年）式步枪。自清末建新军以后，中国军服都模仿日本样式，脖子上有那种缺棱角的领章，再佩戴细窄的竖肩章。这次黄埔学生的军服剪裁模仿俄式，没有肩章领章，至于衔级标志则写在胸章上。他们所持的三八式步枪，其实也并非购自日本，而是由苏联转运来的。学生们由于是经过体检选择入学，个个身体健康，随着口令以矫健的步伐行进着，并齐声唱着《陆军军校校歌》：

莘莘学子，亲爱精诚，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先声。

革命英雄，国民先锋，再接再厉，继续先烈成功。

同学同道，乐遵教导，终始生死，毋忘今日本校。

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

此刻，检阅台下那一个个身着不同颜色将军服的滇、桂、湘、粤、豫军的头领们，都露出有些惊讶的表情。虽然早听说“孙大帅”要办一个新军校，没想到竟然这样快就办成这副模样。尤其是眼前这批军校学生的外观和精神面貌，是他们从未见过的。近代的中国实行募兵制，“插起招军旗，自有吃粮人”，投身军营的大都是失业的流氓无产者。广东兵源不足，各派军阀队伍里的士兵老少不齐，多数还瘦骨嶙峋，面有菜色，滇桂军中还尽是大烟鬼。由于拥挤到广东的军队多，政府无力发钱，于是让他们各占一块地盘自筹自活，军官又大都克扣经费和兵饷，士兵们大都军衣褴褛。占据广州市珠江以南的李福林部还没有军装，官兵都赤着脚，穿一身黑烤绸褂子，从外观到本质都是一群土匪。

看着黄埔军校的师生，再想想自己的队伍，阅兵台上传来一阵阵羡慕夹杂着嫉妒的议论：

“到底是大帅的亲军，多精神呢！”

“人家有俄国的供给，当然神气啦！”

“难怪要联俄呀！明日我们也要去鲍顾问府上，也要请俄顾问，请几个共产党员来做政工！”

站在阅兵台上的孙中山，此时更是激动异常。他不时地回过头来，向苏联顾问鲍罗廷用英语说：“中国革命30年，现在才有了一支真正的革命军！”

出身俄国犹太人家庭的苏联顾问鲍罗廷，此时也很高兴地以英语回话。



红色起点

HONGSE QIDIAN

到广州大半年来，他交往很多，因不懂汉语尤其是不谙广东话，特别由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配给了两名翻译，一个是张太雷，一个是胡志明。前者能讲英语、俄语，后来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在领导广州起义中牺牲；后者更是一位除母语越语外还精通法、俄、汉语并能说广东话的语言天才，成为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创始人和越南人民的领袖。不过在出席国民党领导人的重大活动时，鲍罗廷往往不带自己的翻译，因为孙中山、廖仲恺都曾长期侨居美国，其他不少国民党要员也都通晓英语，相互交谈用不着语言中介。

站在孙中山旁边的宋庆龄，此时也非常兴奋。与自己的丈夫结婚近十年来，经常看到孙中山处于屡遭挫败的焦虑之中，很少见到他这样高兴过。由于宋庆龄从小受英文教育，并上过美国佐治亚州威斯理安女子学院，与鲍罗廷用英语谈话自然毫无障碍。

从鲍罗廷的履历看，可称为一个国际革命家，1903年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时，鲍罗廷就入了党，并成为党内多数派即俄文的“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1905年革命失败后，他流亡美国十多年，在那里的俄国侨民和犹太人中从事革命宣传活动。十月革命胜利后鲍罗廷回到苏俄，不久又作为共产国际特使派驻柏林。上一年9月他奉苏联的派遣作为国家政府的代表来华，被孙中山聘为国民党中央顾问和组织教练员。“教练员”一词在现代社会是体育称呼，可是鲍罗廷奉孙中山之命，对刚刚改组的国民党在政治理论、组织方式和工作方法上都进行指导，名符其实成为政治教练员。

请一个俄国人来“教练”自己如何搞革命，这是孙中山总结几十年斗争经验后所下的一个重大决心。特别是过去搞武装斗争的方法连连碰壁，此前已经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不能不改弦更张。

搞武装斗争和建军队，对孙中山来说其实是几十年来的唯此为大的首要事务。这位名震世界的革命家是广东香山县人，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家，自幼就感到“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小时他常听太平天国老兵讲故事，曾以洪秀全第二自比。以后他得到在海外谋生的哥哥资助，到澳门、檀香山读书，虽然学医却更关心政治。甲午战争爆发那一年孙中山曾求见李鸿章想提出改革意见，好不容易入了高门，一报自己的名字“孙文”，那位李中堂就端茶送客。据说是因他那口粤语发音将“文”读成了“门”，傲慢的李鸿章一听来客连官话都讲不好，又是个小人物，就不屑于谈话。看到官场腐朽，再加上满清当局在对日作战中一再大败，孙中山就此走上了反满革命的道路。



GUANGZHOU QIYI QUAN JILU 广州起义全记录

一校两党，同根异路



孙中山在检阅台上

由于孙中山是广东人，周围的骨干也多是同乡，所依靠的海外华侨又多是粤籍，反清斗争的发端就在广州。1895年他在此筹划起义，确定了“袭取广州以为根据地”。这一秘密行动所依靠的力量是落后的会党，并想收买士兵，并无广泛社会基础，所以一经泄露未待举事就中途流产。

此后孙中山长期流亡海外，不过仍时时不忘在国内搞武装和组织起义。他曾与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等研究方略，提出“我辈须静观清政府之所为如何，暗结日、英两国为后劲，我同志之士相率潜入内地，收揽所在英雄，先据有一二省为根本，以为割据之势。”他又强调“割据”举义首先要“聚人”，同时认为“本党势力多在海外，故吾党在海外有地盘，有同志，而中国内地势力甚为薄弱。”所以他采取的是从海外筹款再到国内招兵买马的方式，特别强调“以在外洋运动款项为第一要义”。

此后多年间，孙中山组织的武装起义几乎形成这样一个模式——先到海外华侨中间宣传并向外国人求助，筹到钱后，以一部分收买那些江湖会党和新军官兵，再买一部分武器运入。有了钱、有了人又买到枪，振臂一呼就打出义旗。可惜的是这种起义发也速，败也急，差不多都是一哄而起，一击就散，都维持不了几天，甚至坚持不了几小时。当时孙中山虽然迭经失败，却屡挫屡起，



红色起点

HONGSE QIDIAN

其革命奋斗精神是令人感动的,可是其举事的方法和依靠的力量却大成问题。辛亥革命虽然一度获得意外成就,迅速推翻了清朝统治,可是原来就缺乏群众基础并没有自己可靠军队的国民党人也马上陷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涣散状态。1913年袁世凯一旦向国民党开战,就如同风卷残云,孙中山、黄兴被迫流亡日本。二次革命遭到惨败后,孙中山认为“吾党成分太杂,权利心太重”,“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因此决定“正本清源”,“屏斥官僚”。为此,1914年9月孙中山又组建中华革命党,提出“此次重组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条件。凡入党各员,必处自甘服从文一人”。并不顾黄兴等人反对,坚持党员在誓词中要“加盖指模”。这种落后的仿照会党结盟的方式,引起众多有自由民主思想的同志反对,只有蒋介石的师傅陈其美大加赞成。结果中华革命党组建后成为一个小团体,只有8省几百名党员,与同盟会成立时会17省之同志,“不期年而加盟者逾万”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

此后,孙中山又恢复了国民党的党名,党员虽然大增,可党内涣散如故,以致搞不清有多少党员,同时没有一支可靠的武装。孙中山原先精心培植的一支军队,是他的老部属陈炯明的粤军。可是因为没有革命信仰维系,陈炯明一旦收到北洋军阀和反孙政客更多的钱,又于1922年反叛孙中山,甚至炮轰大元帅府。陷入困境的孙中山此时向苏俄伸出求援之手,才有了目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局面。

那个身材不高,却精明干练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去年来到广州,主要帮助孙中山办两件事。一是改组国民党,解决组织队伍问题;二是协助办军校,解决培养军事干部以建新军问题。进入1924年之后,两件大事都有了眉目:1月间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了改组,李大钊、毛泽东等共产党人“跨党”进入国民党内还担任了中央执行委员。5月间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入学并开始入伍教育,如今又正式举行了开学典礼,自然令这位洋顾问喜上眉梢。

当“总理”和“鲍顾问”兴奋地相互议论时,孙中山的广东同乡和长期追随者胡汉民此刻也走上检阅台,拿着一份“总理训词”,用广东官话念了起来。此人当时在党内地位很高,孙中山不在由他担任“代帅”,然而其政治立场却是国民党右派,对联俄联共并不赞同,不过表面上还是服从孙中山的决定。这篇训词不长,是用四字一句的半古半白文体写成的,显然有些晦涩难懂。加上胡汉民那口广东官话,使在场的多数黄埔学生听不明白。人们想不到,蒋介石



石后来当政时，将这份校训当作国民党党歌兼中华民国国歌的歌词，又配上如同噪音般的曲子，以至于全国小民百姓月月都要像念经般地吟诵这极为难懂的词句——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
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咨尔多士，为民先锋；
夙夜匪懈，主义是从。
矢勤矢勇，必信必忠；
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胡汉民念完训词，军乐队吹奏之后，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又以“军校总理”的身份向学生讲话。他的口音虽然广东味很重，不过还能让大多数国人听得懂。孙中山的讲话一开始就痛切地说：

“今天是本校开学的日期。我们为什么要开这个学校呢？诸君要知道，中国的革命有了13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像这样看来，中国革命13年，一直到今天，只得到一个空名。所以中国13年的革命完全是失败，就是到今天也还是失败。……”

“中国革命虽然有了13年，但是所用的军队，没有一种是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我敢讲一句话，中国在这13年之中，没有一种军队是革命军。现在广东同我们革命党奋斗的军队，本来不少，我都不敢说他们是革命军。”

听着这些话，检阅台下的各派军队的将领显得有些惴惴不安了，他们显然大受刺激。孙中山接着又强调了一番建设革命军的重要性，最后又强调：

“我们现在开办这种学校，就是仿效俄国。中国革命有了13年，到今天还要办这种学校，组织革命军，可见大凡建设一个新国家，革命军是万不可少的。”

以后的黄埔军校真的如同孙中山所要求的那样“仿效俄国”吗？历史的结论是复杂的。军校的建立本身就充满了曲折，军校师生日后的路程更如同万花筒那样变幻莫测，使人为之目眩……

|| 莫斯科运来的一船煤油，点燃黄埔火种 ||

当孙中山在黄埔军校讲台上称颂苏联的援助并要求“仿效俄国”时，站在



红色起点

HONGSE QIDIAN

旁边的鲍罗廷只发出一丝会心的微笑，作为校长的蒋介石更是一副毕恭毕敬的模样向苏联顾问陪着笑脸。虽然当时对外没有明说，谁都清楚军校没有苏联的援助是办不起来的。特别是前一段开进珠江口的那艘满载煤油的苏俄轮船，奠定了建校的基础。

此时作为军校国民党党代表的廖仲恺，心情格外畅快。此时他不过48岁，较之身边那个皮肤保养得很好并颇显年轻的蒋介石只年长10岁，可是从外貌看却显得有些苍老，简直要大一个辈分。在政治上，廖仲恺是最坚定地支持联合苏联和中共的左派，在经济上他多年来又是孙中山最大的“管家”。孙中山流亡日本时，就长期住他家里，衣食住行都由廖的妻子何香凝负责。此后回到广东，廖仲恺又长期负责料理筹款等事务，负责供养孙中山的军队，整天处理烦心费神的事。前一段筹建军校，又使他身心交瘁，脸上又增加了不少皱纹。



廖仲恺

廖仲恺在国民党内之所以表现进步，与他长期生活在美国、日本，出身华侨有关。这一点与孙中山颇有近似之处。正如周恩来1943年春在《关于1924至1926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这篇回忆中所说的那样：“廖仲恺是国民党的左派。因为他是华侨出身，与国内的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关系较少，所以更多地带着民族资产阶级进步派的倾向。”

黄埔军校的建立，与廖仲恺的政治进步和煞费苦心是分不开的。年初国民党一大决定建立军校时，碰到的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经费，廖仲恺多方筹集，也所得甚少。孙中山下令要各军给予帮助，可是大家向这位孙大帅要钱的时候容易，掏钱可就难上难。出于面子，有的军给了一万，有的给二万，还是一次性捐助，不肯再给。作为孙中山主要财政来源的广东筹饷局，也只答应每月资助5000元。而开学经费至少需要二三百万元，杯水车薪，何济于事！

当时广州市内除了河南的地盘由李福林盘踞外，基本上都由滇桂军阀刘震寰、杨西闵控制。前年陈炯明叛变把孙中山赶出广东后，是刘、杨两人于去年率军东进打跑了陈军，把“孙大帅”和国民党党部迎了回来。凭着这个功



GUANGZHOU QIYI QUAN JILU 广州起义全记录

一校两党，同根异路

劳，国民党当局只好容忍他们以枪杆子把持市政，靠开烟馆赌馆抽捐抽税。廖仲恺拿着孙中山开的批款条去找刘震寰、杨西闵二人，往往是吃了晚饭就去，到半夜才能回家，幸运的话一次能拿回来几千块钱。

何香凝开始还奇怪地问自己的丈夫：“为什么天天这么晚才回来？”

廖仲恺叹着气回答说：“你哪里知道，我一晚上都要坐在他们抽鸦片的床边，等他们过足了瘾，高兴了，才能要一点钱回来！”

这样筹措军校经费，哪里能够济事！归附国民党的旧军阀们不肯解囊还不仅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更重要的还是政治上的敌视。这些目光短浅的家伙也能看得出，孙中山要开办军校培养一支“党军”，这本身就是对他们不信任，并要依靠这支队伍日后来顶替甚至对抗他们。要让这些军阀掏腰包，培养日后挖自己墙脚的人，岂不是与虎谋皮？

当时被任命为校长的蒋介石，只是介绍了一班过去相识的保定军校同学如顾祝同、刘峙等到校任职，对具体筹办事务完全是“撒手掌柜”的态度，甚至长期不到任视事。若论起资历，蒋介石此时在国民党内辈分还很低，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他不是盟员，一年后在日本靠着陈其美介绍才入了会并认识了孙中山。辛亥革命时，蒋介石在斗争史上是无名之辈，后人只查出虚衔是团长，只有一项“功绩”是为夺取了上海政权却因狂嫖滥赌被称为“杨梅都督”的陈其美当杀手，在医院中秘密暗杀了同盟会内另一巨头陶成章。此后在反袁、护法斗争中，他时而出山担任过幕僚、军参谋长。时而在上海做做生意。在陈炯明叛乱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时，蒋介石赶去随侍，与总理“共患难”一个多月，大得孙中山赏识，被授予粤军参谋长的职位。

对这样一个并不专心致志的“革命党”人，孙中山却委以重任，除了蒋介石在前一段的关键时刻帮过大忙外，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国民党内力量平衡的需要。蒋介石在党内辈分虽然不高，直至1924年初国民党一大时还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却是江浙派势力在孙中山身边的重要代表。孙中山组织反清、反袁斗争，身边的主要干部有两派，一是以胡汉民、陈炯明等为代表的广东派，一是陈其美、张静江等为代表的江浙派。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后，陈的徒弟蒋介石的地位自然上升。后来孙中山在广东建立根据地，不能不主要依靠粤系军人和政客，却也感到受制于人，需要找江浙人与之保持平衡。正是出于这些原因，当苏联建议开办军校时，孙中山就选择蒋介石而不找广东人任校长，并派他与中共党员张太雷等五人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了



红色起点

HONGSE QIDIAN

解办校情况。筹办军校时蒋介石并不积极,认为没有油水的差使,一度辞职跑到上海,孙中山一度曾授意湖南军人程潜接任。这时张静江一面抱怨蒋介石没有长远眼光,认为办军校可以为江浙集团争一份势力,一面由上海赶到广州面见孙中山,要求让蒋复职。孙中山当年从广东去欧洲搞革命活动主要靠财主张静江解囊资助,再加上要看江浙派的面子,所以待军校筹备完成后还是找蒋介石回来就职。

至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开学前一度撒手不干,固然有经费短缺的原因,然而内心深处还有一个当时不便对外明言的理由,就是对苏联和中共不满。他于1924年3月12日复廖仲恺书中,就表述了他对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仇视。由于廖是他的多年旧交又系黄埔军校的军政搭档,这封私人信件写得十分露骨。直至1931年5月蒋介石出版《反省录》时为了证明自己反共早有“远见”,才将其公诸于世。

在这封信中,蒋介石首先对廖仲恺热衷于联合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表示规劝,称:

“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不染指之意。”

依蒋某此言,说苏联“三分可信”还是为了不扫廖仲恺之兴趣。接着,蒋介石又依据其前一段和张太雷等人一起访苏的见闻称:

“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亦不免堕落耳。”

廖仲恺对这封信如何回答虽不清楚,然而他的实际行动显然是不赞成蒋介石所为。在校长撒手不管,广东其他各派军阀歧视兼敌视的情况下,廖仲恺仍然积极筹办军校,并继续向苏联顾问和中共负责人寻求帮助。此外,廖仲恺还积极依靠广东当地一些有志于国民革命的军人,其中特别中意的一个是粤军的英才邓演达,一个是建国粤军二师的参谋长叶剑英。

当时的叶剑英,是一位身材适中、眉目英俊的只有27岁的军官,此时虽然还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却是孙中山主张的国民革命的忠诚拥护者。他出身



广东梅县山村一个不得志武秀才之家，祖籍为客家人。因父亲困窘和子女众多，叶剑英从小一边读私塾，一边和穷孩子们拾柴割草，中学未及毕业就随父飘洋过海到马来西亚谋生。在受外人歧视并难以找到工作的困境中，他深感到改变国家和自身的命运应返国闯荡，于是回国进入免费的云南讲武堂。在炮科学习时，叶剑英见到一个日本教官依仗着剑术精湛，在讲武堂内目空一切，傲视中国人，内心受到很大刺激。于是他刻苦练习劈刀术，然后公开向这个日本教官提出挑战，并冒着危险接受了以真刀比试的要求，结果当众打败了这个大和武士，一时名震全校。

在云南讲武堂学习期间，叶剑英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理论。毕业后他投奔广东，在拥护孙中山的粤军中任职，先当见习参谋，后来还当上了大总统随员。1922年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时，孙中山躲往“永丰”舰避难，身为海军陆战队营长的叶剑英率部乘“宝璧”舰跟随护卫。在此期间，他也认识了跟随孙中山身边的廖仲恺和蒋介石，并以自己的军事才能给他们以很深的印象。正因为如此，在筹建黄埔军校时，廖仲恺就专门请已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的叶剑英到校兼任教授部副主任，参与了建校的工作。

叶剑英到了黄埔军校后，有机会接触共产党人，思想日趋进步，并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当时组织上虽然没有批准，却让他的同乡熊锐单独找他谈过话。

筹办军校期间，叶剑英和其他人员一起，作计划、编教材；布置校舍，招生和聘请教职员工，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去做。靠着廖仲恺开始筹到的一些款子，校内教员招聘初步完成，向全国各地已经发出了招生通知。可是在此关头，广东各派军阀又不肯拨钱，迟迟才赶到广州上任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不想任何办法，决定撒手不干。2月间的一天，蒋介石的秘书王登云突然召集筹备处的全体人员开会，宣布了一个使全体人员吃惊的决定：“蒋先生已决定黄埔军校不办了，筹备处立即解散，每个人都有规定的旅费资遣回籍。准备从上海前来的学生，要打电报阻其勿来……”

接着，王登云拿起一张清单念了起来，上面是每个筹备处人员的遣散费数目。

顿时会场上大哗，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有些纯属受雇来谋生的人感到无所谓，可是多数人还是为国民革命的奋斗目标而来，自然不愿这么不明不白地散伙。叶剑英当即站起来责问王登云：



红色起点

HONGSE QIDIAN

“办校是孙总理的决定，蒋一个人就要宣布解散，是为什么？我们表示抗议！”王登云支支吾吾，一时说不出个道理来。叶剑英回过头来对大家说：“我们都不要领遣散费，不要散伙，坚持下去。廖先生还在，我们去找他问个究竟。”

许多人和叶剑英一起找到廖仲恺，大家情绪非常激动，都表示不想散伙，并问蒋介石为什么要走？廖仲恺出于过去的交情，没有指责蒋氏，却肯定了众人的意见。他肯定地宣布：

“第一，这个学校是要办的，不管蒋先生来不来当校长，我们也要办。

第二，你们都是蒋先生找来的，同蒋先生共事多年。君子爱人以德，你们应从大处爱他。他走了你们照样办，照常开学。那时开学了他不来就不行了。”

要坚持办校，根本问题还是要解决经费。孙中山、廖仲恺此时只好去找鲍罗廷，得到的回答是尽可能想办法，显然是要请示国内。此时的苏联刚刚经过了十月革命后毁灭性的三年内战，百废待兴，老百姓的衣食问题还没有解决，莫斯科市民每天定量的面包大都不够吃。加上英法日美等国对苏联援助他国革命十分敏感，有再度实施武装干涉的危险，因此苏联来华的军事顾问的对外名义，都自称是受雇于广东政府的“战后失业军官”，以示是自己来中国找饭吃的。其实，此时广东政府不但无力管饭，而且顾问还要送给“雇主”钱款，实在是有些为难。

令人高兴的是，难题很快得到了解决。3月间，一艘苏联油轮开进了广州港，随后开始拍卖船上满载的煤油，据说得到了300万元。这笔钱随即给了国民党当局，恰恰能满足黄埔军校的开学经费。显然，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经过考虑，还是认为应该节俭自己，支援中国革命，因为这也是苏联在东方打破列强封锁的最关键一环。

钱的问题得到解决，招生和办学就得以顺利进行。4月间，全国各地国民党党部介绍来的考生大都到达广州，加上当地的青年报考者，大约5000人参加了统一考试，最后录取了470名，算得上是“十里挑一”。正式开学以后，又把湘军学堂的160人也并入黄埔军校，这样使黄埔一期毕业生达到600多人。

军校筹办大致完成时，前一段撒手不干的蒋介石也从上海赶回了广州，态度也大为积极起来。据当时的军校苏联总顾问契列潘诺夫回忆，他与这位校长见面时，看到的是一副满脸堆笑的面孔，并不时听到他对苏联大讲种种奉承话。对于这个刚刚在上海滩交易所混过几年的人来说，此时到军校来显然也



是一个很值得投机的事业，风险虽存在，而更大的机会和利益却在召唤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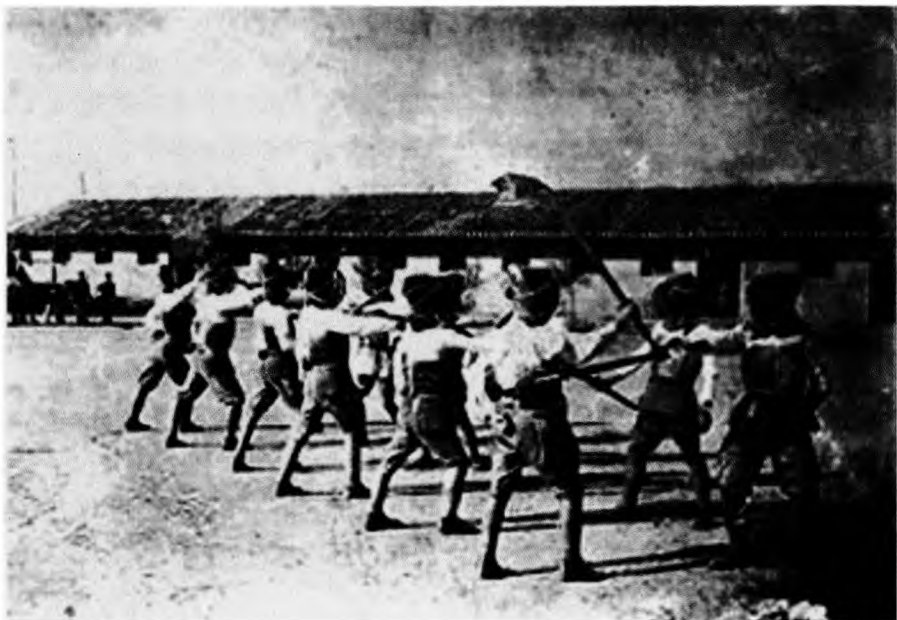
当时从选址来说，这个亦称长洲岛的黄埔岛被认为是一个适宜办军校之地，有现成的校园。清朝末年这里曾建过培训海军人才的水师学堂，黎元洪即从这里毕业。后来，两广总督一度在岛上办过广东省陆军小学。民国以后因连年战乱，校址荒废，因此第一期招生不过400多人，再加上教职员工和卫兵，军校总共不足千人，大部分生员没有住所。此时又没有经费在岛上重新建房，所以多数人住的都是临时搭设的竹棚。要选这个距广州不远不近的地方建校，还有一个孙中山、廖仲恺不便明言的原因，就是这个珠江中的岛屿便于防守。许多表面上归附的各省军阀很看不惯这座培养党军干部的学校，甚至有仇视和消灭之心，只是海军比较忠实，当初陈炯明作乱时孙中山就靠“永丰”舰救驾。日后一旦广州有事，不易马上危害到黄埔，黄埔却便于救援。即使有人来攻，凭岛防御也容易，海军还可以支援。果然，下一年广东国民政府组织消灭刘震寰、杨西闵这两派军阀时，就从广州市区内把政府和中央银行都撤到黄埔，军校校园还一度成了“临时首都”。

1924年5月初，学生基本到校，于是正式开始上课。然而作为一个军校却没有几条枪，更没有炮。这个“陆军军官军校”训练的是初级军官，枪炮应该是最基本的教具。孙中山亲笔下命令给石井兵工厂，要他们拨300支粤造毛瑟枪给黄埔军校，可是军校只领到了30支，只勉强够站岗用。这种情况，自然使别的军阀轻视黄埔军校。滇军第三军军长范石生见到蒋介石，就以嘲笑的气口说：

“你在黄埔办的什么鸟军校！你那儿几根吹火筒，我只要一营人就完全可以缴你的械。”蒋介石听后慌了，回到黄埔长洲岛，就赶快要学生修工事。可人家要是真的来攻，凭那么几条枪，有了工事又管什么用？

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再请鲍罗廷帮忙。5月下旬，一艘苏联货船又秘密驶入珠江口，一批学生乘夜前去卸船。黄埔一期学生李奇中在回忆录中曾记述说：

“苏联供应军校武器是分批秘密运来的。我参加过两次起运武器的工作。头一次大约在六七月间：有一天夜晚，我们学生第二队奉命坐小火轮出发，不知道什么任务。半夜，小火轮驶抵虎门要塞区威远炮台附近内港，停靠在一艘大海轮旁边。我们学生看到这条大船的舱面上堆满了木材，还以为是用来搬运木头的。等到队长宣布后，才知道这条大船是从海参崴开来的，运送枪



黄埔军校学生军训

械弹药和军用器材给黄埔军校的。为了避免帝国主义海军的阻挠，所以舱面用木料伪装起来。我们乘夜起运这批军械，首先用起重机将舱面上的木料吊起来抛入海里（因为没有地方卸放），打开舱盖，仓里还是塞满了木头。我们把木头都起出之后，才起出许多木箱子，这是军械的包装了。天亮的时候，才起卸完毕。这是苏联帮助我们的第一批军械。以后苏联还用这种伪装掩护的方法运送过好几批，包括山炮等武器，适应于完整兵团的装备。除了黄埔军校所需的武器以外，后来北伐战争的武器弹药等等都是苏联供应的。”

李奇中那时是共产党员，后来参加了北伐、南昌起义和早期的井冈山斗争，在红四军中还当过团长。他在湘南被俘入狱，被黄埔一期的国民党同学保出来，就此脱党。解放战争期间他担任过国民党第十六绥靖区副司令，又找共产党联系，解放后作为起义将领被安排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苏联那时与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有外交关系，又考虑到西方列强的反应，为了对外不暴露援助国民党的真相，开始送来的枪支都是日制的三八式步枪，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卖给沙俄的装备。后来也运来过俄制1891年式7.62步枪。这种枪当时在中国很少见，解放后的中国观众却很眼熟，就是



那种在《列宁在十月》等电影中经常见到的带锥形刺刀的长枪。

除了步枪，当时苏联还运来过山炮、重机枪、轻机枪（当时又称手机枪）、驳壳枪等。步科、炮科的学习解决了基本教具，学校还有了自卫能力。此后黄埔建立了武器仓库，苏联船送来援助国民政府的大量武器，大都不进入广州港，而是直接开到黄埔港卸货，从这里视情况再分发到各部队。蒋介石作为一个粤系军人轻视的“外江佬”，几年前到广东时只是光棍一条，毫无基本队伍和实力，靠孙中山的任命也只能给人当幕僚长。此刻，他掌握了军事干部培养大权，又掌握了苏援武器的分配权，军校带来的利益真是大出意外！在那时的中国，“有军则有权”，谁枪多谁就势大。此时的黄埔军校不仅向外输出军官，还输出武器，两广及至其他地区的许多军阀也纷纷前来讨好。蒋介石靠着军校训练军官，靠着苏援经费招募士兵，又有俄制武器来装备军队，一下子成了“暴发户”。

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学时，校长蒋介石的实力不过是2100多名学生和100名教官。

半年后第一期学生毕业，蒋介石以这些学生为干部，并派人拿钱到浙江家乡再招兵3000，建立了两个教导团。1925年夏天，这两个教导团又扩编为两个师，再收并粤军一个师，组建了第一军，兵力有2万。在广东省的各派军队中，第一军的人数、装备都居首位，军长蒋介石一跃而成南国最大的实力派。正是靠着这一点，蒋介石发动“三·二〇”事变震慑了各派势力，随后两广军队北伐时大家只有推举他为北伐军总司令。北伐之后，他又以黄埔系统的第一军为基础不断招兵买马，扩充起庞大的中央军，占据了大半个中国。所谓“黄埔建军”，成了蒋介石发迹最重要的一页。

国民党后来经常咒骂共产党“拿卢布”、“靠苏俄豢养”，其实中国共产党搞武装斗争倒真是白手起家，蒋介石才是靠苏俄援助发迹。不过人们不能因为蒋介石后来政治态度的变化，就否定起初苏联支援中国国民革命的努力。何况办黄埔军校得益的不仅是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人恰恰也是通过这个军校迈开了进行军事活动和建军的第一步……

|| 黄埔群英荟萃，蒋介石独重蒋先云 ||

在黄埔军校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之际，在野的共产党人与在位的国民党



红色起点

HONGSE QIDIAN

人心情同样激动。开学时,检阅台下的教官和学员队伍中,也有几十名共产党员,他们同样是热血沸腾——“总算有了一个学军事、拿武器的地方了!”

此刻在黄埔军校中职务最高的共产党人,是周恩来加入共产党的介绍人张申府。1924年初筹建黄埔军校时,他刚刚从中共旅欧支部回国,受李大钊委托前往协助工作,并在军校初建的政治部担任了副主任。另外军事教官队伍中的区队长金佛庄、茅延楨等人是共产党员,学生中的共产党和共青团员也有几十人。

张申府是黄埔军校最早的政治部负责人,当时的主任虽然是戴季陶挂名,实际上戴长住上海,很少到广州来,来到军校也是偶而讲讲课,不大管事。可以说军校从筹建开始,政治部就由共产党人负责。这个张申府任职只有两三个月,并没有留下太多的业绩,此后他与陈独秀发生争执而自行脱党,直至80年代去世时还是民主人士,中共党史上也很少记述此人。不过他在军校史上所做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推荐周恩来接任了自己的职务,从而开辟了中国军队中革命政治工作的第一章。

据张申府老人在周恩来逝世后所写的回忆录中记述,他到广州后就参加了军校筹建。当时主要由校党代表廖仲恺主管人事安排,经常找张申府谈工作。一次戴季陶出面请客,在餐桌上廖仲恺又说起军校缺乏得力的政工干部,并对张申府说:

“你刚刚从法国、德国回来,在那里有为的中国青年不少,是否可以介绍一些优秀学生到军校来工作,尤其是做政治工作?”

张申府听后,感到这是一个推荐中共优秀干部的好机会,于是向廖仲恺介绍说:“在欧洲时我认识一些很有为的青年,他们也很想回国工作。例如在法国有一个叫周恩来的青年人,很有作为。”

廖仲恺大感兴趣地说:“那好哇,请你开一个名单怎么样?”

于是,张申府马上开了一张15人的名单,上面大都是中共的干部,第一名就写着“周恩来”。在名单中,还列上了当时留学日本的中共党员周佛海。

随后,张申府对廖仲恺和戴季陶说:



张申府



“周恩来人才出众，但是个穷学生，要他回国需要汇些路费去。”

廖戴二人马上说：“那没有问题。”

其实当时军校花的钱，基本都来自于苏联提供的经费。不过是用俄国共产党的一些钱转经中国国民党之手，来资助中国共产党人。

随后，张申府写信给周恩来谈到此事。此时的周恩来已经阐发了革命必须有武力支持的主张，见有一个能从事军事活动的机会，十分高兴，马上回信表示愿意到黄埔军校工作。8月间，周恩来从法国回到广州，经中共中央同意到军校工作。他见到张申府时兴奋地说：“黄埔军校大有可为。”

张申府推荐的周恩来，不仅成为黄埔军校革命政治工作的开拓者，而且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创始人之一。张申府推荐的周佛海虽然代表留日的共产党小组参加过中共一大，回到广州后却脱离了中共组织，一心投靠国民党，后来还当了蒋介石的秘书，成了反共先锋，抗战时又堕落成遗臭万年的汉奸。革命年代的大浪淘沙，有的人奋进，有的人堕落，是很正常的现象。

在黄埔军校筹建阶段，刚刚到广州召开了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中央负责人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等人搬回了上海，不过他们对党员能参加军校工作和学习仍表现出很大兴趣。之所以如此，还是应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主要是由于刚刚失败的“二七”大罢工的实践证明了在中国没有枪杆子就一事无成。

刚刚建党之时，陈独秀等领导人认为当务之急是开展政治活动和工人运动，根本没料到搞军事。1922年萧劲光等人在苏联学习了军事并向陈独秀报告，得到的回答却是大发雷霆的批评——

“你们学军事干什么？想当军阀啊！”

可是没过多久，1923年2月中共组织起平汉铁路上万工人罢工时，军阀吴佩孚一下令开枪镇压，随着林祥谦、施洋等烈士殉难，声势浩大的工会组织也马上瓦解。血肉之躯挡不住子弹，中共中央这时开始痛感到没有武力保护就难以开展工农运动。

虽然想要武力，可是当时中国共产党自己又没有建立军队的条件。党组织处于受查禁的秘密状态，一缺少军事干部，二无一点地盘，三缺乏经费，独立建军实在是难以着手。从理论上讲，初创的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经费应由党员缴纳的党费解决，其实这一点在中国根本办不到。在不合法的状态下，一个人参加了共产党并以主要精力进行秘密活动时，就难以再获得正常收入。再加